

# 赵本山潘长江演节目笑坏孕妇遭索赔

近日,赵本山和潘长江两大喜剧之王成为电视观众和媒体热议的话题。原因是,由潘长江首次执导的《清凌凌的水 蓝莹莹的天》最近也在央视一套播出了,而在它之前播完的赵本山的《乡村爱情2》刚刚拿到超高收视率。

从收视率和口碑来看,潘长江没有整过赵本山。但是潘长江说:“这两剧没啥可比性,当年在铁岭县剧团我们俩就是好朋友,感情非常深厚。”赵本山对此也回应说:“我和长江应该说曾是一个壕沟里的战友,我们是最早的搭档,朋友关系是永远的!”

近日,笔者经过独家专访,了解了赵本山和潘长江这两大东北笑星,从最初在一个剧团演小品到各自成名路上的深厚友情。

## 赵本山镇住科班出身的潘长江

潘长江与赵本山的相交要追溯到20多年前。那是1984年仲夏,考入铁岭县剧团仅两年多的潘长江,应邀参加辽宁省举办的全省农村优秀小戏大赛。潘长江虽然个子长得矮小,但自幼受到身为评剧演员的父母的艺术熏陶,转型唱二人转后,很快就在当地成了名角。

在去省城演出的路上,潘长江就听团里的人说,这次与自己同台演出的还有团长从民间请来的一个高人,叫赵本山。

潘长江一听心里就笑了,什么民间高人,再高不还是来自民间,还能超过科班出身的不成?

潘长江虽然心里这么想,但演出时却特别留意。潘长江当晚演出的是二人转《四圣巧戏猪八戒》,很巧的是,他刚在一片欢呼中下场,赵本山就出场了,表演的戏是《摔三弦》。最后,两人的节目都获得了优秀奖,但从质量和观众的喜爱程度上看,赵本山的明显要高过潘长江。演出结束后,潘长江主动找到赵本山攀谈,两个人聊得很投机。当时的赵本山还是铁岭县莲花乡一个农民,只是被西丰县剧团借调做临时演员时,给当时地方戏作家李忠堂留下深刻印象。随后,李忠堂创作了拉场戏《摔三弦》来参加比赛,主角就选了赵本山。

谈及理想的时候,赵本山说:“我不想一辈子窝在农村那山疙瘩,就想将来能去剧团演戏!”“赵大哥,肯定能行,说不定我们还能成为搭档同台演出呢!”潘长江意味深长地说。

没想到,此话很快就应验了。因此这次的出色表演,不仅潘长江被调入铁岭市民间艺术团,而且赵本山也被破格招进了铁岭县剧团,并且在两年后也被调到了铁岭市民间艺术团。

两人一见面,就拥抱在了一起,潘长江眯着眼睛说:“本山大哥,咱们这回可成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 赵本山成名不忘拉兄弟一把

来团里不久,团长让两人排练一出双簧戏,就是前面的人比划做动作,后面的人说话。

这种戏需要两个演员默契地配合,而且需要彼此对戏情特别投入,不然肯定演砸。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潘长江和赵本山只排练了一次,竟然就非常的合拍。

“不错,就你们两个了!”团长竖起拇指,铿锵有力地说了句。原来,团里的编导李春明创作了一出拉场戏《大观灯》,因为戏里的两个人物比较特殊,一个是盲人一个是瘸子,因此要求两个演员配合要好,之前团里的几个演员也练了几次,但都演不好,现在终于找到人了。

此戏一炮走红,让观众笑破肚皮,笑岔了气,火爆到一连演了200多场,场场爆满。有一次演出,一个孕妇看潘长江表演时的那怪相和滑稽样儿,乐得不行了,就一下子站起来,没想到那凳子就歪了,她不知道,一下坐地下,摔流产了。后来,她找到团里要求潘长江赔偿损失,潘长江听后是哭笑不得。后来赵本山出了个主意,在剧院门口贴了个风趣的通告:孕妇、夫妻,还有刚动完手术者,慎入内,以免乐极生悲!

1987年3月,因这出戏,把两人从铁岭带进了沈阳,并迅速红遍东北三省。

1988年,赵本山与辽宁曲艺团的巩汉林合作演出了他们的第一部小品《如此竞争》,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然后,张超又为赵本山创作出小品《相亲》。并被早已留意赵本山很久的春晚导演郎昆力荐,通过了1990年中央电视台晚会节目审查。

赵本山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但潘长江却还没有被全国观众所熟知。为此,赵本山很是着急,潘长江“能演、能唱、能

跳、能翻”,而且是科班出身,比自己要有优势,只要有机会,一定能成气候。为此,正在北京演出的赵本山专门给潘长江打电话:“长江啊,大哥知道你的实力,努力啊,明年春晚说不定我们会同台演出!”说完一番鼓励话后,赵本山还把自己当初的搭档巩汉林推荐给潘长江,希望他们能一起合作。

潘长江在与巩汉林合作后,果然也一发不可收拾,很快杀入了北京,冲进了春晚。

## 潘长江劝说赵本山妥善离婚

那年的一个仲夏之夜,刚刚躺上床的潘长江,接到赵本山打来的电话:“长江,最近我一直很郁闷,睡不着,这个周末有空吗?咱们哥俩聚聚,我有件心事想和你聊聊!”潘长江当即答应了下来。

“在老家的时候,我刚19岁,还没明白咋回事儿呢,就稀里糊涂地跟家里给我介绍的对象把婚结了,虽然结了婚却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在茶楼里,赵本山叹了口气,突然话锋一转,“长江,我挺羡慕你的,有个相爱的人,说实在的我现在很想离婚,但一直心里很矛盾,七上八下的,你说哥们我该怎么办?”

原来,前阵子赵本山去大演演出的路上发生车祸,赵本山骨折受伤,被人送进了医院。当时随行的辽宁艺术学校漂亮的女老师马丽娟,主动担当了照料赵本山的任务。在马丽娟照料下,赵本山的伤很快就好了。并在短暂的时间使得两人不仅仅是“有嗑儿唠”,还擦出了爱的火花。但赵本山毕竟是有妻子的人,他现在不知道应

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妻子。

潘长江听赵本山说完后,坦诚地说道:“其实家庭肯定不光是吃饭喝酒抱孩子睡觉的地方,还应该精神上的相互理解和互相支持嘛……我支持你的选择,不过我希望能尽量做得圆满些,尽量减少对别人的伤害!”“老弟,谢谢你,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赵本山感激地说道。

不久,赵本山与前妻葛淑珍“心平气和地离婚了”。离婚时,赵本山把全部积蓄25万元、三室一厅的房子和一辆旧夏利汽车全部给了前妻,并且还负担两个孩子成长的全部生活和教育费用。随后,赵本山与马丽娟结婚,并生下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一双龙凤儿女。

## 东北二虎事业上懂得互相扶持

1999年,潘长江凭着在电影《明天我爱你》中朴实、幽默的演技,出人意料地荣获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听到这个消息后,赵本山多少有些震撼,虽然此时的赵本山已经是全国的小品之王,全国的观众年三十就等着盼着他的小品,但长时间重复着同样的工作,让他也多少有点倦怠,也很想换换思维换换脑。

于是,赵本山就约潘长江相聚,开门见山地说:“我最近也想在演小品之余,转下行,专心拍个电影电视剧什么的,你看怎么样?其实,我一直有种恐慎,万一有一天我的小品逗谁都不乐,我该怎么办?尝试做些新东西,也算是学习!”潘长江说:“好事啊,给自己多找几个支点,人生会更丰富多彩,我

支持你!”

与潘长江分别后,赵本山开始尝试演戏,并接连了几部戏。结果,他的《男妇女主任》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自己也被评为“优秀男演员奖”。赵本山刚走下领奖台,就收到了潘长江的短信:“大哥,我在外地拍戏不能赶回为你祝贺,我知道你能行,你现在也是三栖保护动物了!”

2006年,正在辽宁拍电视剧的赵本山,接到了潘长江的女儿潘阳打来的电话:“赵叔叔,你快劝劝我爸吧,最近他总和我妈吵架,明明是自己错了也不承认……”赵本山挂了电话后,心里一想就明白怎么回事。于是,赵本山寻思了一会儿,给潘长江打电话:“长江啊,最近过得怎么样?我最近又闷又烦,回家就向你嫂子撒气……”潘长江沉默了一会儿,说:“本山大哥,我感觉自己最近也好像要犯病,杨云跟我二十多年了,最近我们……”赵本山看潘长江入了套,赶忙宽慰说:“你可别像我一样,也把杨云气走了啊,人有时最容易伤害的就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2007年春节前夕,赵本山和潘长江一起被辽宁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邀请去录制节目。赵本山和潘长江都是辽宁春晚的常客,但这次他们不但自己来了,还把各自的爱女也带来参加春晚。赵本山看两个小丫头一起携手走过来,笑着对坐在一旁的潘长江说:“看这两个闺女多亲,和咱俩当年差不多!”

这就是赵本山和潘长江,一对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的喜剧双王! 王发财

# 红军长征途中情报专家与敌手的决斗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的情报工作,在一些著作当中,特别是回忆录当中,有不少零星的说法,但对其进行较为系统、客观、全面的研究还很少见。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尤其是信息战已经成为战场主宰之时,显然有必要看清楚,当年的情报工作究竟对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 每个重要转折点背后都有秘密

对中央红军的长征事先究竟有没有准备的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莫衷一是。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有准备,但准备不足,中央红军长征出发非常突然。现在看来,当年的这种情况实在与情报工作有密切的关系。

据当事人莫雄在《我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计划转交中央》的回忆录中写道,1934年9月底,他奉蒋介石命令上庐山参加秘密军事会议,获得了关于第五次“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文件,他立刻组织人一面紧急密电党中央,一面“将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纱纸密写抄录,然后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伪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地送上瑞金”。

有了这一史料就容易理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军步步紧逼,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转移已是势在必行,当然得有所准备,但在获得情报后必须于10月中旬趁“铁桶”尚未合围,就紧急转移,显然准备是不充分的。

中央红军长征后,第一个

重要决定是通道转兵,不按照原计划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是折向贵州。据伍修权回忆:“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大口袋等我们去钻。”于是红军领导层对行军路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对这一问题,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有回忆,她这样写道:当时毛泽东对王稼祥说:“我们已从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壁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地操劳扑空。”王稼祥点头说道:“这个情报我也知道了。”可见,红军突然转向贵州也是以情报为依据的。

学术界对遵义会议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但在对敌人围追堵截之下,遵义会议为何还能开得如此从容,却至今几乎无人提出疑问。通道转兵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并不全面。可以说,情报工作起到了更重要、更直接的作用。据当时担任红军总部作战参谋的吕黎平回忆:“从(负责侦听敌台的)总部二局破译的敌人电报中得知,追击红军的薛岳兵团的两个纵队虽然已经入贵州,但尚未渡过乌江。蒋介石围攻遵义的部署亦尚未完成。党中央与军委立即利用这一空隙时间,就地休整扩大红军。”

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是土城之战,这一仗之所以没能打好,是因为情报工作出现了失误。据杨尚昆回忆,在战斗打响后几小时,“彭总发现敌

军的兵力不是原先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9个团,火力很强,立刻建议军委:‘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

继土城之战的是二渡赤水后的桐遵之战。这一仗之所以胜利,情报的准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红军截获了“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龙云《作战方略》的电令,了解到敌人对红军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黔北的军阀王家烈部,因此决定回师东进杀回回马枪。

桐遵之战让蒋介石痛心疾首,连呼“奇耻大辱”。1935年3月2日,蒋介石赶到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启用“铁桶计划”,就地遍筑碉堡与重点进攻相结合,以捆住红军双腿使其难以“运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蒋介石决定自己赴贵阳“御驾亲征”。

重庆地下党很快就获取了蒋介石刚制定的行动计划并传给了红四方面军,而后者又立刻传给了中央红军。这一机密情报显然对红军领导层决定放弃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而南下贵阳起了重要作用。

面对危局,刚刚掌握军事指挥大权的毛泽东充分表现出一个成熟统帅的胆略,一个大胆的军事行动已在胸中酝酿成熟,他巧妙地利用蒋介石即将到达贵阳的情报,开始了至今看来仍令人赞叹不已的“斩首行动”,命令红军秘密地第四次渡过赤水南下贵阳。

毛泽东先是指挥红军做出进攻遵义而不打算南下的假象,在得知蒋介石已经到达贵阳后的几小时就立刻命令红军迅速南下,昼伏夜行,很快就兵临城下,迫使蒋介石调出守卫云南的滇军以“护

驾”。在电台监听到滇军出动东进的消息后,红军立刻绕过贵阳城向西南疾进,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云南。

聂荣臻在回忆1935年4月9日红军通过贵阳城郊那天时说:“我写的是:‘我对蔡大姐说:快走!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的五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蒋介石本人也在贵阳,这中间只有约三十里宽的一个口子,我们要赶紧插进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红军对敌情了如指掌,从而保证了自己的行动神出鬼没,蒋介石要想围住红军无疑是天方夜谭。

红军侦听对手电台以获取机密的行动,直到北渡金沙江前夕,才因一个偶尔的失误被国民党军发现。事情原委是这样的:红军到了云南后,一个参谋被敌俘去,他带有一些被我们破译出来的敌军电报底稿。龙云发急电向蒋介石报告此事,蒋介石接电后,规定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但都被红军猜出来了。

## 红四方面军的大力支持

中央红军在长征的过程中,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在情报信息方面的大力支持。

在中央红军长征的前期,由于刚离开根据地,原有的信息渠道基本中断,加上每天的行军作战异常紧张,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架设电台通讯联络,更别耐下心来细致地侦听敌情。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给中央红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

军密码电报破译法。这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在长征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年红四方面军负责接待廖承志的傅钟后来说:“那本密码电报破译法万分宝贵,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我们都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当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侦察电台,也多亏了有承志同志带来的破译法,才得以把我们的侦察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按军委指示,及时转了过去。”

对于这段历史,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徐向前曾给予高度评价。

## “玻璃杯瑰宝”让红军大胜

在以往对长征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红军电台技术人员对决策所起的基础和关键作用。处于今天日益了解信息和日益重视信息人才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要取得长征的胜利,红军电台的侦听技术人员默默地做出了何等重大的贡献。

在长征途中,红军领导层与情报部门往往是形影相随。据吕黎平回忆,长征中担任红军总部二局副局长钱壮飞“是侦破敌人情报的专家”,“那时我们几乎天天同他打交道,不是他和曾希圣(二局局长)来一局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汇报敌情,就是我们去二局查询情况”。

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台,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

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

由于他们破译了上至南京蒋介石下至战场师团长的秘密电报,因此也就使红军领导层对敌军的战略部署、战役意图和部队动向一目了然,造成了对手在明处而红军在暗处的理想局面,从而牢牢把握了战场主动权,使得对手处处陷于被动。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动态却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仅靠飞行员在空中肉眼侦察,非但雾里看花,更致命的是一往往被早已胸有成竹的红军略施小计就上当受骗,使侦察的结果帮了红军的大忙。如为了欺骗敌机的空中侦察,红军在这些日子里发明了一些简单而又实用的绝招,如行军途中敌机突然飞临而来不及隐蔽时,部队就在统一号令下来个全体向后转,给敌机造成错觉。

因此,从战场信息掌控这一点来看,我强敌弱的形势实在是显而易见的。而取得这一关键成果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双方电台极少的技术人员在交战中红军技高一筹,真是战场决战岂止在将军。

从上述史实不难看出,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除了目前人所共知的原因外,实在是与情报工作分不开的。对此,毛泽东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隔着‘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孙果达/文 摘自《百年潮》